

蔣委員長抗戰必勝圖訓奉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務處



MB
D693.04
911

073
441



3 1763 8112 1

蔣委員長論抗戰必勝訓詞釋義

凡例

- 一、蔣委員長論抗戰必勝原文採自廿八年一月廿六日在五中全會訓詞。
- 二、章節段落乃編者所定。
- 三、原文用大字，頂格；釋義用小字，低三格。
- 四、釋義所引據事實情報截至廿八年二月底止。

序

管子曰：「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夫無可勝不拔不散之道，則天也。今也既有必勝不拔必不散之道，則當使人人澈知而確信之，庶以堅其戰心，守志與聚力。

戰之勝敗，兵學之事也。全國最高統帥，亦全國兵學之泰斗也。言戰事之形勢，宜以其言爲最重。故今取其言而闡釋之，不別爲文。

二十八年三月編者識

蔣委員長論抗戰必勝訓詞釋義



(南)

(一)

我現在所要向各位同志講明的，就是敵國目前已經失敗，且有種種理由，證明他最後一定要遭受最大的失敗，我們祇要奮鬥下去，就有必然勝利的把握。

先就敵人方面來說：且不提這十八個月以來，他在我中國南北各戰場上死傷了七十萬以上的官兵，消耗了九十萬萬的戰費（按此乃用最低的估計，據最近一種估計已達一百六十五萬萬），弄到他國內羅掘俱窮，農

工停滯，社會墮落，釀成政治上的騷亂不安。這些還都是有形的跡象。就是從他發動侵略到現在，一切戰略上的運用，以及對我們中國的觀測，預計，和他對時代的認識來講，實在是處處違反了原理，步步陷入於錯誤。

第一、敵國這次發動侵略，人人知道是實行他的大陸政策。所謂大陸政策，依照他們內定機密的傳統政策和他們公開的「田中奏摺」，是要先佔滿蒙，再圖侵略我們中國的全部，乃至獨霸亞洲，統一全球。但他在佔領東北尚未穩定之時，而就要來侵佔華北；他的力量達到華北以後，又由慢性的侵蝕，變為急性的鯨吞，於是公然來佔我們平津，這已經和他既定的國策與

戰略，完全是背道而馳了。不單如此，他還要再進而至於華中，甚至侵入華南，佔我廣州，這是他更進一步的破壞他們自己的傳統政策了。他進入了華中華南以後，不但戰略上陷入進退不能的地步。就是政略上也迫令他不能不倒行逆施，與世界列強為敵，陷入於四面楚歌的絕地了，這是他第一件必敗之道。

按倭國這樣步驟凌亂，舉棋不定，都基於內部的分裂矛盾。這分裂矛盾從一九一八以後，日益明顯，從他兩次震動世界的內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是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件：由少壯軍人參加的恐怖團體公然刺殺了首相犬養毅，大藏大臣井上，財閥領袖團琢磨，並焚燬了東京警察所，及三菱銀行。二是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件：東京第一師團的第三聯隊士兵千多人，由二十個下級軍官領導叛亂殺死了大藏大臣高橋，御璽大臣

齋藤，軍事教育總監渡邊，並且殺傷了許多重要人物；他們還要殺西園寺公望等許多元老重臣，都因為未被找着而倖免。這兩次大暴動都是少壯軍人鬧出來的。發動雖由少數人，他們背後却有廣大的勢力，透入了全國軍隊的勢力。原來倭國的少壯軍人多半是從中等階級的下層出來的，他們代表小地主，小工商業者，和自耕農的利益，他們和大財閥，大資本案，高級官僚，及貴族軍閥，是立於對敵的地位。他們時時刻刻想推翻這些特權階級的勢力，而建立軍事的獨裁。他們的口號是打倒自私的資本案，打倒貪污的政客，救濟農民，救濟小商人，節制大資本，減低利息等等。關於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傾軋下文還要詳細說到，現在要注意的；這種傾軋已深刻地反映在整個的軍事機構中。在盧溝橋事變以前，倭國的政府就好像建築在將近爆發的火山之上，也好像依靠於將近潰決的堤岸之傍，時時刻刻會粉碎淪沒於軍民暴動之下。為挽救這種危機，倭軍閥官僚不得不找尋

一個嚴重的對外的目標，以轉移全國的視聽，並給少壯軍人以外活動的機會，免得他們在內爲亂。簡括的說，他們不得不製造「國難」，以消弭「國變」。他們之放棄素定的國策，易穩健的蠶食爲冒險的鯨吞，不惜以國命作孤注一擲，實是勢迫處此。却不知道日暮途絕，倒行逆施，斷無成功之理。

第二、他對我們中國最初的企圖，是要不戰而屈，但我們終於戰而不屈，已經非其意料所及了。既戰之後，他就想速戰速決，但自南口，淞滬，忻口，南京，一直到了魯南會戰，以及鄆陽湖邊，大別山脈之戰，一步步深入，終於不能速戰速決，於是反轉來又渴望速和速結。在我們未退出武漢以前，他的雜誌報章上，就竭力鼓吹中止戰爭，或設法停戰，一面用種種狡計

詭謀，想誘我們入彀，欺騙世界，圖取便宜。但是不久他又圖窮七見，拿出他所謂「興亞院」「東亞協同體」一套狠毒計劃出來。現在不但我們全國民衆洞悉其陰謀，就是世界上也灼見其野心所在。他這個企圖又明明失敗了。這是他戰略企圖上的第二次失敗。

按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是一個最高妙的戰略原則。因為戰而屈人之兵，無論怎樣勝利，總要付若干代價。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不付任何代價而達到作戰的目的。這是再便宜沒有的了。倭國當初未嘗不想應用這原則。所以開戰之前，倭少將松室在給關東軍的祕密報告裏，最後提出「帝國對華的工作方法」六項，頭兩項就是（一）「以威力脅迫並鎮壓（中國）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

勝之效，(2)慎勿以實力粉碎(中國)各實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損失」。倭人對中國的目的，抽象的說，就是要夷中國爲他的保護國，爲他的獨佔的殖民地；具體的說，就是要(1)以參加防共協定的圈套，使我失却外交及內政上的自主，(2)以經濟合作的飾辭，使我全國的資源受其支配；(3)以若干地域特殊化或許倭駐兵的條件，使我軍事上完全受其控制。蘆溝橋事變之前，倭大使川越和我外交部的交涉，就是想靠虛聲恫嚇，不戰而達到這目的。但我們的最高領袖成算在胸，洞燭奸計，屹然不動，毅然不屈。倭人遂不得不發動蘆溝橋事變。這是倭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企圖的第一次失敗。蘆溝橋事變後，倭人依然想用外交手段，使我中止派兵北上，並撤退華北駐兵，而束手受其宰割。但我們的最高領袖始終屹然不動，毅然不屈。倭人遂不得不進兵上海，攻取南京。這是他們「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企圖的第二次失敗。既不得已而出於一戰，倭人第

二步的企圖是「小戰而屈人之兵」，希望把戰事時間上縮至極短，範圍縮至極狹，以最少的犧牲達到降服中兩目的。所謂速戰速決，速和速結，都可歸納在這原則之下。所以南京陷落後，我們主力還沒有虧損，倭人便頓兵不前，假手於德國的調停，希望我一挫而餒，俯首接受上述一類的亡國條件。但我們的最高領袖始終屹然不動，毅然不屈。反利用這機會，作再接再厲的整備，使我的戰鬥力比戰前更強。這是倭人「小戰而屈人之兵」的企圖的第一次失敗。及至我從武漢廣州全師而退，倭首相近衛又作誘降的表示，其措辭之巧滑甜蜜，為倭人歷來對華的外交辭令所沒有，連汪精衛先生也上了他的當。但我們的最高領袖始終屹然不動，毅然不屈，反給他一個義正詞嚴的駁斥，弄得他馬上曳尾下台。這是倭人「小戰而屈人之兵」的企圖的第二次失敗。大家知道：倭軍閥是和我民族不並立於天地間的死敵，他們之利，就是我們之害；他們之所好，就是我們之所惡。

；他們之所畏忌，正是我們之所欣慰；他們所急切希求，正是我們所當堅決拒絕。他們望我國不戰而屈，我國就應當大戰，久戰，全面死戰，而絕對不屈。這個真理說明固甚簡單，但緊握這個真理，以天下之至定應天下之至變，天崩地拆而不動心，海濱河翻而不變色，却非有天下之大智大勇不辦。敵人會有中道誘降的詭計，我們的最高領袖遠在開戰之初，開戰之前，早已預囑。所以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蘆溝橋事變剛發生之後，他在有名的「廬山談話」裏，就剴切指出：「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國民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國最後的勝利。」這悲壯的宣言的發出和這悲壯的宣言的固守，就確證了我中華民族的偉大。由於最高領袖的精神的感召，我全民族果然億兆一心，為這宣言所啓示的真理而光榮而作破釜沉舟的奮鬥，十八月以來，前方將士視死如歸

，後方民族茹苦無怨。這種精神，這種氣魄，是我國過去任何對外戰爭中所沒有的。大家須知，我民族目前所遭，固然是有史以來所僅見的大難，我民族目前所表現的毅力，也是有史以來所僅見的大勇！以空前的大勇應空前的大難，民族史中還有比這更光榮更有價值的一頁嗎？我們面對這一頁的歷史應當怎樣鼓舞奮發！能於這一頁的歷史有所參預，人生還有比這道更光榮更有價值的事業嗎？能為參預這一頁的歷史而死，人生還有比這更光榮更有價值的死嗎？

第三、從戰略上來看，他不單違反三個軍事上的原則（按此三原則詳

「第五」項中），而且更犯了軍事上三個大忌：（一）不知己不知彼。

他始終沒有夢想到我國抗戰到十八個月之久，不但不為所屈，而且愈戰愈強，他也沒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

之後要疲竭到以他五個人來拚我們一個人的地步（在第二戰區有我方死一人而敵軍要死十四人半的統計）。（二）他一味希圖取巧僥倖，妄想以輕巧取勝，而結果適得其反。完全違背了孫子「兵貴拙速」的原則。弄到政潮迭起，反戰空氣日濃，他們所自誇爲唯一戰時內閣的近衛文麿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證實了孫子所謂「兵久而國不利」的名言。（三）古人所謂「頓兵深入」的大忌，原爲對強者而說的。現在他從東海邊頭，深入到幾千里外我國的內地。使得他已佔領的地區，都變成了我們正規軍和遊擊隊縱橫活動的勢力所在。處處要受我們的控制，時時遭到我們的打擊。欲進則愈陷愈深，要退則到處荆棘。這真是做

到了孫子所謂「鈍兵挫銳，屈力彈貨」的地步。已經踏入了孫子所說的「誘侯乘其弊而起」的危機。簡單說來，目前形勢，敵人雖已自陷於孫子所稱的「挂形」的境地，真所謂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到了「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的地步了！這是他戰略上最顯著的失敗。

按第(一)(三)項所指示的道理，可歸納爲一條歷史的公例，就是：「凡客軍深入敵境，遭堅強的抵抗，而作持久的戰爭，則客軍終必覆敗，其所屬的國家甚至滅亡」。一部世界軍事史就是這條公例的註腳，讓我們略引中西史蹟，加以闡明。在我國歷史中，最可以證明這條公例的莫如戰國時代。戰國初期最強的國家不兵秦而是魏。魏之由盛而衰的關鍵就在以客軍深入敵境，作長期的戰爭。魏惠王(卽「孟子見惠王」的惠王)費了二十年

的時間歸併趙國，經過連續用兵之後，終於攻陷了趙的都城邯鄲，並繼續佔據了三年之久。但趙國並不屈服，繼續抗戰。等到齊國來救，魏大敗於桂陵，遂不得不退出邯鄲。魏的國力，由此衰耗。但惠王還不省悟。當他最之一次侵略趙國時，齊又來救，把他的十萬大軍覆滅於馬陵，把他的太子廢去，把他的大將龐涓殺掉。後來「諸侯乘其弊而起」，魏遂一蹶不振。讀過孟子的人，大概還記得惠王對孟子訴苦道：「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這就是長期深入的侵略戰爭的必然結果。後來齊國燕國都曾蹈魏的覆轍。齊湣王乘燕國內亂，佔據了燕的首都及其國土大部分，有二年之久，終因燕人紛起反攻及諸侯窺伺欲動，不得已而撤退，接着湣王又拚着全國一萬乘的兵力去吞滅四千乘的宋，苦戰年餘，勝利是得着了，領土是擴大了，但經這兩次斲喪，齊國已筋疲力盡。燕昭王看準機會，便糾合諸侯，向齊報仇，把齊

的首都攻破了，殘毀了，把齊國的土地，除莒和即墨兩城外，全部佔領了。燕軍繼續盤踞齊境，凡六年之久，但莒和即墨兩城始終堅持不下。憑這兩個孤城和各地民衆響應的力量，齊國終於將燕軍全部掃出境外。齊燕兩國都因爲深入敵境的長期戰爭而衰耗了，後來束手爲秦所滅。孫子這部書雖然託名於春秋末年的吳將孫武，實際當於戰國中期之末人所做的，他看慣了上述二類的事例，所以歸納出「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及「兵貴勝不貴久」的原則。秦國就很能接受這個原則所指示的歷史教訓。他首先用「遠交近攻」的手段，拆散六國的聯合（卽所謂合從），同時把鄰近的三晉（韓，趙，魏）和楚韓流地一點一點的蠶食，一片一片的剝割。每次攻略，都是適可而止，一勝卽休，從不肯作深入持久的遠征，甚至每每真心實意地退還大部分佔領的土地，以速與對方媾和。等到三晉和楚的險要割盡了，土地所餘無幾了，戰鬥意志全喪失了，同時燕齊也因互鬥而兩敗俱傷

了，依然用遠交近攻的手段拆散六國的聯合，然後把他們各個擊滅。秦併六國的策略是這樣巧妙的。他一點也不忙，一點也不亂，從不讓野心壓倒了忍耐。反之，假使秦國一時性急，正當六國合從的時候，却向他們同時進攻，要把他們一氣吞滅，那麼秦的最後的覆亡，便不待龜著而可斷定了。現在倭國所採的正是和從前秦國相反的策略。現在的中國就好比合從的六國，倭人要一舉吞滅中國，就好比秦要一氣吞滅合從的六國，何況合從的六國到底是六個國家，而現在中國則是一整個有民族意識的國家呢？何況秦的敵人只有六國，而倭的敵人除中國外還有四個比中國強什百倍的國家呢？倭國的最後覆亡豈不是更不待龜著而可斷定嗎？

再看西洋史。在西洋史中密窺深入敵境作長期戰爭的例，最著名的有二：一是古羅馬與迦太基的「第二腓尼基」之戰（西元前二一九——二〇一），二是十四世紀時英法間的「百年戰爭」。兩者都是客軍最後失敗的例。

在「第二腓尼基之戰」中，迦太基大將漢尼拔率大軍從西班牙，沿高盧（今法國）南部，越過阿爾卑斯山，以達意大利（當時西班牙屬迦太基，高盧意大利皆羅馬國土）。在意大利境內，漢尼拔居留了十七年。頭十五年中，他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在最劇烈的一役，殲羅馬軍五萬人，俘一萬人。但羅馬人並不因敗而餒，在非比亞斯大將的領導下，抗戰到底。非比亞斯採用一種特別的戰術，以對付迦太基人，後人稱爲「非比亞斯式的戰術」，那就是：力避與敵正面衝突，步步後退，誘其深入，同時擾其後方，斷其交通，截其糧食輜重，絕其援兵，攻其瑕隙，以達到消耗並圍困敵人的目的。這種戰術和我們現在對倭寇所採用的大略相同。憑這種戰術非比亞斯終於把漢尼拔圍困在意大利南角的喀拉布里亞。迦太基的軍隊，精銳全銷，一籌莫展。漢尼拔遁回本國（即西西利島），率領國之衆，來作最後一戰，結果却是一敗塗地。這是漢尼拔第一次的敗績，也就是給迦太

塞的致命打擊。其後不久，迦太基便爲羅馬所滅。「第二腓尼基之戰」證明了「非比亞斯式的戰術」，也卽我國現今所採的戰術，有可以致勝之道。試想漢尼拔以十五年的全勝尙不免最後的覆滅！何況倭寇僅僅一兩年的暫時小勝？何況倭寇在過去十八個月中已遭遇許多次的慘敗？何況倭寇現在深入的程度，已遠過漢尼拔，而且將來更甚？何況倭寇根本沒有像漢尼拔那樣雄才大略可以統馭全國軍人的領袖？

倭寇近來一方面重頭謀和，一方面他們的宣傳者却每每硬着頭皮說要使中倭戰爭「百年化」。却不知道這外強中乾的驕誇恰是最惡毒沒有的自詛，也正是他們瞪大眼睛跳火坑的愚蠢的寫照。因爲「百年戰爭」這個名詞乃源於西洋史中十四五世紀時英法間的戰爭，而這場戰爭正是侵略者深入久戰而最後失敗的最好例證。你說倭寇的宣傳着低能不低能？在「百年戰爭」中，英是侵略者，法是被侵略者，而英是島國，法是大陸國，這是和現

在中倭間的情形相似的。在經濟政治及軍事的組織上，當時英國卻比法國進步，這也是和現在中倭間的情形相似的。但那次戰爭和現在的中倭戰爭至少有兩點齊大的不同。第一英國當侵略的勢力全盛時把法國的領土幾乎全部佔領了，並且盤踞了有三十多年，只留下法國東南叢嶺一隅之地，和有名無實苟延殘喘的法國王室。反之，如蔣委員長在下文所指出，目前倭寇侵略中國的力量雖然用到極限了，他的勝利已登峯造極了，他們名義上是佔領了中國領土的一小半，事實上只佔領了幾個據點和幾條交通綫。據點之外，交通綫之旁，我們的政府依然存在着，我們的國旗依然飄揚着。第二、直至全國領土幾乎失盡之前，法國始終是封建諸侯割據的世界，四分五裂，沒有統一的政府，沒有一點民族自覺的精神。有的諸侯並且和英國勾結。所以英國能用法國人去打法國人，在一個時期，英國在法國境內所用的軍隊有一半是法國人。所以法國的土地喪失得那麼容易。反之，

中國自抗戰以來，內部是絕對統一的，人民不論在淪陷區域或在內地對於倭寇是一致同仇的。在百年戰爭中法國所遭受的艱危困苦真不知幾千百倍目前中國所遭受。然而法人憑藉彈丸的殘餘領土，終能轉敗爲勝，轉弱爲強，終能驅逐外寇，光復舊物。這轉變的關鍵，不是物質力量的增加，也不是外來的援助，而是民族意識的覺醒。原來敵人長期的壓迫和蹂躪，在法國人心中漸漸醞釀了一種潛伏的民族意識。但這種意識的喚醒，和法國民族復興的運動的勃發，却是由於一個十八歲的農家女子的精神感召。這是幾乎使人難於置信的歷史奇蹟。這西洋史中最著名的女英雄名叫厄克約翰氏，他自信是受了上帝的使命來拯救法蘭西民族的。當奧利安城被英軍圍攻將陷，法國正當危急存亡的時候，他戎裝跨馬，挺身獨去赴難。他的宗教的啓示，提高了法國人必勝的信心。他的愛國的精誠，悲天憫人的至情，和壯烈的犧牲精神，盪動了每個法國人的心，沸騰了每個法國人的血。

。他獨領一軍，當先陷陣，屢戰屢捷。英軍畏他如神明，法國人愛他如聖母。他有一次受了傷，法國人因之更加感奮。後來他雖然為英軍所擄，活活燒死。但他所激發的民族復興運動已成了掀天撼地的狂潮，直把英人驅逐出境才止息。「百年戰爭」的歷史，不獨證明在長期的反侵略戰爭中，被侵略國有轉敗為勝，轉弱為強的可能，並且證明了這種轉變的因素，「精神重於物質」，「民衆重於士兵」，「宣傳重於作戰」。

第四、就政略上來說：他對於中國，祇能拉攏若干形體不全，聲名狼藉的敗類做傀儡，利用流氓土匪做爪牙；一方面加深他軍人腐化；他方面更暴露出他種種罪惡與愚蠢，供舉世的嘲諷，而且不自度量，妄想以他東扯西湊做效模擬而得的文化，來併吞我們中國悠久獨立的文化，以武力政治侵略，來掠奪我們

的經濟。結果不但弄到他束手無策，一事無成，而且反加深了。他國內以下剋上的現象。至於在外交方面，他本來企圖緩和蘇俄，結果祇自形其卑怯，妄想交歡美國，更引起其反感，存心拆散英法美的陣線，而結果又適得其反，步步支離，處處矛盾，這就是所謂根本既錯，枝節就一無是處了。

右示倭寇政略上的失敗，約分三點：（1）對中國，「以華制華」的奸計不售。（2）對內，想製造「國難」以消弭「國變」，反因國難而加強「以下剋上」的趨勢，促進國變的危機。（3）對英美法俄外交政策的失敗。第三項自明。第一二項分釋如下：

（1）歷來侵略中國的外族，人口總比中國少，如宋末的蒙古，明末的滿洲，少好幾十倍。現在的倭寇也少六七倍。蒙古滿洲之所以能控制中國的大

部分以至全部都靠利用漢奸，換句話說，就是「以華制華」。現在倭寇也想師其故智。殊不知時代改變，這策略已完全不適用了。或者有人會問：現在倭寇所到的地方，不是都有漢奸替他組織偽政府嗎？殊不知現在的漢奸與宋明末世的漢奸，性質絕異，所處的境地亦絕不同。第一、宋明末世的漢奸，主要的乃是本朝的驕將重臣，投降外族的。最著的如宋末的留夢炎，劉整，呂文煥，范文虎等；明末的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黃梧，施琅等。但現在我們政府屬下的將士，人無分新舊，地無分南北，有一個倒戈的麼？絕對沒有。我們政府屬下的官吏，有一個對倭寇降志辱身的麼？絕對沒有。敵人所能拉攏的漢奸全是些無業無賴無知無能的敗類。我們自開戰以來，只有血戰而失的土地，却無開門納寇的降城。這是宋明歷史中所絕對沒有的現象。這固然是我們的將吏的光榮，也是我們民族意識的勝利。第二、宋明末世的漢奸可以說是積極的主動的漢奸

。而現在的漢奸祇是消極的被動的漢奸。宋明末世的漢奸多半甘心效忠異族，自告奮勇，做他們得力的鷹犬。有的成了他們的謀主，爲他們運籌帷幄，參與機密。例如留夢炎洪承疇之類。有的爲他們出生入死，驅驅疆場。例如蒙古滅宋的大軍分東西路，西路以宋降將呂文煥率水軍爲先鋒，東路以宋降將劉整率騎兵爲先鋒；滿洲平定雲貴全靠吳三桂，平定廣西全靠孔有德，平定廣東全靠尚之信耿仲明，平定台灣全靠黃梧施琅。像兩類的漢奸，現在倭寇手下有嗎？絕對沒有。現在的漢奸乃是真正的傀儡，必待倭寇在旁邊牽扯着纜動，而且動得很勉強。他們只是爲着利祿或衣食而虛與倭寇委蛇，絕沒有爲他們建功立業的想望。倭寇根本不信任他們。他們飽受了倭人的凌踐後，時時刻刻在提心吊胆地踩着倭人的顏色。本來「酷主之下無忠奴」，何況這些奴才根本是沒用廢物呢！第三、即使這些漢奸有替倭寇活動的意志和能力，環境也不容許他們活動。鋤奸的志士和鋤奸

的組織佈滿了敵人的後方。在上海，在杭州，在北平，在天津，不時轟傳出這些志士的壯舉。這又是我們民族意識的勝利。從漢奸被狙擊的容易也可看出敵人在佔領區內的實力之薄弱。漢奸越活動，越露名，死得越快。所以他們中職位稍高的都尸居深閣，端端自危。他們方且要靠倭人的保護才能苟存性命，如何能爲倭人作得力的鷹犬呢？倭人對於他們只能拿來作個招牌，希望藉以掩蔽自己侵略的罪惡而已。豈知這罪惡愈蓋愈彰！由於以上的三種原因，倭寇「以華制華」的奸計注定失敗。

(2)關於倭國內變的危機的促成，即「以下剋上」的現象的加深，可分兩方面來說。第一、對外的戰爭雖然把少壯軍人和長老軍閥間的裂隙彌縫於一時，但在戰事的進行中少壯軍人的數量一天天的增加，權力一天天的膨脹，地盤一天天的擴大，氣燄一天天的高盛，結合一天天的密切。尾大不掉之象必成，太阿倒持之勢必至。一旦戰事停止，或遭到逆轉，他們回過

頭去，繼續追循五、一五二、二六等類事件所指示的路徑，則倭國長期的內亂，可以立待。第二、上面說過，倭國軍人的分裂實反映着整個社會內部的矛盾，而這矛盾轉因戰事而急劇加深。本來在世界上一切國家中倭國是資產最集中，貧富的懸隔最甚的。英人歐脫萊女士，曾根據一切西方所能的到關於日本國情的報告和統計，著了一部書，名叫「日本的泥腳」，把倭國的眞面目暴露無遺。這部書因爲取材的豐富和敘述的精細，在盧溝橋事變以前已風行歐美。根據這部書，倭國的經濟分配情形大略如下。全國總投資的百分之八十三以上是被小數資本百萬元以上的大公司佔有了。另外全國工商組織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只佔到總投資的百分之二以下。三井三菱兩大公司支配了全國的經濟生活。小規模的工商組織雖很多，但他們只是大金融商業機關的經紀人和剝削工具。他們以低工資僱工人，而把製造品轉賣給羅斯大金融商業機關；他以高利借款與農民而以賤價收買農

民的產物，轉賣給壟斷的大金融商業機關。至於佔人口百分之六十的農民，生活是怎樣的呢？他們不分佃農或自耕農，耕地都極小，平均每戶僅兩英畝半，而且有百分之六十九的農戶，耕地在兩英畝半以下。因為耕地普遍的太小，用機械不合算。因為農業沒有機械化，生產力很低。倭政府用全力去補助工商業，對於農業不大措意；在水利建設（如灌溉排水等）及防災工程上，都用費很少。因此水旱流行，其類多與普遍，皆非一般工業化的國家所有的。因爭灌溉水利而起，或因水災無以為生而起的農民暴動，近年不知道有多少。因為倭政府統制新聞，外間不大知道罷了。佃農要納生產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地租給地主。自耕農雖不用納地租，但政府對他們抽很重的稅，遠比對工商業所抽為重，看下表便知：

每年進款	納稅所佔進款百分比	
	自耕農	商人製造家
三〇〇	三四·九	一二·五

五〇〇	三一・四	一三・七	一七・七
一〇〇〇	二五・九	一三・九	一三・六
二〇〇〇	二八・〇	一六・四	一七・八

一般農民，耕地既小，生產力又低，租稅又重，災患又不免，結果只有三條出路。第一條出路是借貸。據日政府正式估計，在一九二九年農民負債總額為四十五萬萬元，一九三二為六十萬萬元，現在恐怕超過了八十萬萬元。日本共有農戶五百六十四萬餘。以八十萬萬元計算，平均每戶負債一千四百餘元。利率平均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以八十萬萬元計算，每年應付利息八萬四千萬元。而倭國農業生產的總數包括蠶繭，肉蛋，牛奶等，共值十八萬九千三百萬元，農產品的價中，幾乎有一半付了利息，換句話說，歸入資本家的囊中。農民的第二條出路是把女兒賣給娼寮做妓女，

或給工廠做苦工，這是很普通的現象。這兩種被出賣的女子，在契約期滿之前是絕對沒有脫離的自由，她們就成了實際的奴隸。人口買賣和奴隸制度是受「日本文明」保護着。一九三四年「帝國農業會社」曾在北方四縣作過關於出賣女子之樣本式的調查。結果是：在這年的頭十個月內四縣四百五十萬人中，賣出了女子五萬零三十四人。這就說，不到一百個人中，就有一個女子被賣做娼妓或工奴。農民的第三條出路是挨餓。東京日日新聞曾說過，倭國每年人口加二百一十萬人，但有四十六萬個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死於饑餓。一九三四年冬，因為旱災，衣食不足的兒童在北海道有三萬人，岩手有三萬六千人，大森有一萬餘人，交部大臣承認是年全國衣食不足的兒童有二十五萬人；是年其中部養蠶區域有百分之七十至八成的農民沒有飯吃，在最肥沃的倉庫區域百分之三十的農民沒有飯吃。試想以倭國的自驕自大自文自飾，和統制新聞的嚴密還露出這些消息。其他外

間沒法知道的悲慘情形可想而知了。警察偵探的防範和鎮壓縱可收效一時，但人民對饑寒窘迫的忍耐力，對少數財閥豪商貴族的嫉恨的禁制力是有限度的。叛亂的徵兆五、一五、六、二六等事件已經顯呈了。倭會還不省悟，放下國內大多數人的痛苦不顧而「謀動干戈於外」，陷入無窮期的戰爭的漩渦。長期戰爭對倭國民衆的影響是怎樣呢？戰爭使軍需工業擴大，倭國的軍需工業是由私人經營的，結果財閥是越加發財了。軍需工業擴大，則別方面的工業不得不退縮，則一般的製造品不得不減少。這造成物價騰貴的一個原因。爲了生產減少，又爲了歐美普遍排斥倭貨，出口減少（現在對歐美的輸出已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四），外匯缺乏，倭幣價值下降，這又造成了物價騰貴的一個原因。倭國在經濟上是絕對沒有外援的，爲了支付巨大的軍費（現在已達到一百六十五萬萬元了），不得不濫發紙幣（過去兩年間已發到三十萬萬，較之戰前增加了三倍）。通貨膨脹，又造成

了物價騰貴的一個原因。戰費的來源，除了濫發紙幣外便是發公債（至去年十月底止已發了七十萬萬日元）和增稅。光在「北支軍糧特別稅」的名目下，過去二十月來已增稅三萬一千七百萬，下年度還計劃增加二萬萬，將來還不知要增加凡幾。這是一概一種新稅而論，其他舊有稅項的增徵還不知凡幾。這些增加的賦稅和公債的負擔，最後自然歸到大多數民衆身上。

〔本來已呻吟憔悴的僑國民衆又負擔上物價飛騰和增加的賦稅及公債的三重壓迫。戰爭愈久，這三重壓迫愈來的利害。務有一天，他們被迫到必須於餓死與革命之間選擇一途。帝俄和暴德在歐戰中的覆轍，倭寇是注定要重蹈的。〕

第五、講到他對於我們中國的認識，他既不認識我們中國自來民族潛在抵抗力的雄厚，也不認識現在是民族主義發達膨漲而

不可遏制的時代，又不認識我們中國歷史的真相。他一味以元清自待，終以中國民族爲可欺可亡，不成問題。而不知道中國當年挫敗的主因，在於當年朝廷內極少數人，不明敵情，不辨利害，精神受敵脅制，終於被敵欺誘降服，並非我們全民族的滅亡。現在敵人竟妄想在「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之下，於短期內遂行統治我們中國的夢想。他全不想想他侵略我們東北，費了四十年以上的光陰，用了很大的兵力，耗了不少經費，至今依然不能控制我們東北，更無論乎統治。這種眼前的事實教訓，他還不知省悟，反而要變本加厲，併吞我們中國的全部，甘蹈最近失敗的覆轍。這就是由於他根本不認識我們中國民族

，不認識我們三民主義的力量，不認識我們國民政府的特性，更不認識今日的時代，以及今日中國的革命戰略與革命戰術。老實說，從前拿破崙侵略帝俄，那時節全面攻擊和長期抗戰的戰略戰術，還沒有發明，拿破崙以如此雄才，擁有如此大軍，尚且不免於覆敗，何況今天我們是一個民國，民族精神普遍發達，舉國民衆敵愾同仇，在國民政府命令之下，實行現代革命的戰略和戰術，任何武力，也決不能僥倖求逞。孫子「地形篇」有「知敵之不可擊，知吾卒之不可以擊，知地形之不可以戰」之三大原則。我今再爲孫子續一原則曰：「一知敵之可擊，知卒之可以擊，知地形之可以擊，而不知時代之不可以擊者，則無勝

道也」。敵人不知對方之情勢，尤其不認識時代，更不待煩言而可明。

按倭寇把現在的中國看作宋末明末的中國，他自己看作宋末的胡元，明末的滿清，這個意味就足以陷他們於萬劫不復的深淵。宋明末季和我們的時代有一個根本的差異：宋明末季沒有自覺的民族意識，而目前中國正處於民族意識飛揚蓬勃的時代。所謂民族意識，就是各個人認定全民族的福禍利害：榮辱安危，即是自己的福禍利害，榮辱安危，而自願獻身為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而奮鬥。沒有民族意識的民族好比一盤散沙，有了民族意識的民族好比一團的黏土；沒有民族意識的民族好比無聲無息的死水，有了民族意識的民族好比排山倒海的潮流。在宋明的末季，朝廷與地方，政府與人民，人民與軍隊，都是休戚不關，情意隔閡的。目前中國則在抗日的偉大目標之下，全民族已搏結為一整個同生共死的有機體。胡元與宋作戰，

滿清與明作戰，乃是以國力的全部與一個皇室及其臣僕作戰。現在倭寇與中國作戰，乃是以國力的一部分與一個哀憤彌天誓與暴敵借亡的民族的全體作戰。宋明的末世，因為缺乏民族意識，所以當國命垂危的時候，內部還不能一致，或互相牽掣，使兵力不能盡量使用，或變起齟齬，使敵人得乘機取利。（宋在襄陽失陷之前幾年，都城內不斷發生兵變。所以襄陽陷後，沿江告急時，京師一帶雖有七十萬兵，因為內變須防，政府不敢把他們調到前方去，蒙古遂得兵驅直下。明季北京既失，弘光即位南京後，始則高傑與黃得功爭駐揚州而互鬪，高縱兵焚劫，殺人有如草，繼則湖廣守將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焚武昌東下。良玉死于九江，其子夢庚繼領其兵回南京進攻，宏光不得不分兵抗拒，方相持間，而清兵已渡淮了。後來夢庚遂投降了清朝。）又因為缺乏民族意識，所以敵軍到處，疆吏守將紛紛迎降，名城重鎮，敵人可以唾手而得，並且無須分兵駐防。雖有不少殉

城殉職的忠臣烈士，炳耀歷史，却抵不過叛臣降將所造成的頹勢。這兩種現象都是宋明之所以亡，而現在所絕對沒有的。現在更要注意的是：當時朝廷中負責的人，因為缺乏民族意識，根本沒有抗戰到底的決心與勇氣。他們不明敵情，以為敵人無可抵抗之道；他們不知利害，以為乞降有可苟存之望。當元兵迫近臨安（南宋都城，即今杭州）的時候，宋朝的土地還剩有現在福建廣東的全部和江蘇，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的大部分，很可以遷都再戰。但朝廷計不出此，主張遷都最力的韓震先被異黨殺了。大家一盡投降。從他們所上元朝的降表，便可以充分看出他們精神上怎樣為敵人所憎服。那降表道：「宋國主燕謹百拜奉表言。累渺然幼沖，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與師問罪，累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累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所

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累三百餘年宗社還至殞絕，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朝廷並且下令州郡將吏，一律投降，不許再戰。但結果怎樣呢？宋室全族被擄北遷。宋朝「三百餘年宗社」終「至殞絕」，「趙氏子孫」淪爲囚奴！再看明季，當清兵渡淮，攻陷揚州的時候，明朝大江以南的疆土完全無恙，很可以遷都再戰。然而當時南京的朝廷怎樣應付呢？清兵以宏光元年五月初二日進至瓜洲。明季南略（卷二）載，是月「初七日……集百官（在）清議堂議事。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奕琛，陳于鼎，張捷，張有岑，錢謙益，李喬，李治，唐世詠，楊維垣，秦鏞，張孫振，饒增，趙之龍（馬士英宰相兼兵部尚書，餘皆最高級官吏）。各竊竊私語。百官皆不預聞。臨散，李喬唐世濟齊聲相和曰，「便降志辱身也說不得了」。後有叩諸大僚者，皆云，「大清信雖急，如今不怕了」。蓋密議藉之龍納款於清也。是日靈晦，大風猛雨，人心洶洶。」這

樣的朝廷，如何能不覆滅呢？上面的事實可以充分證明：蔣委員長所謂「中國當年挫敗的主因在於當年朝廷內極少數人不明敵情，不辨利害，精神受敵脅制，終於被敵欺誘降服」，乃是極精確的歷史判斷。

在宋明末季，政府的中樞沒有抗戰意志，將吏缺乏犧牲精神，民衆沒有被組織起，自然不會實行現在我們所使用的「革命的戰術和戰略」。關於「革命的戰略和戰術」，蔣委員長在別處曾有詳細的解釋，茲引錄如下：「我們革命黨，做的事情，不是做平常的事情，是做非常的事情。所以革命軍的軍隊打仗，亦是要打非常的仗，不是打平常的仗。平常軍隊打仗，一個兵去打一個敵人，就算是好的了。我們革命軍隊打仗，一定是至少要一個兵來打敵人十個兵才行的。比方國際間一國與一國打仗時，不但是前方很整齊，就是後方勤務也弄得很完備，什麼準備，都很充足。預備好了，才來打仗。至於我們革命軍打仗就不同了。那一天有敵人，那一天要打仗

。四方八面，千千萬萬的敵人，拿我幾百個革命軍人便要打破他。因為革命軍是以少數打勝多數，不一定說他有多少兵，我也要拿多少來應付他。他有了補充，我們沒有補充，就不能打他，這就不是革命軍的戰術了。革命軍之所以可貴，就是不在數量，而在質量，不在物質之多寡，而在精神之有無，如果我們革命軍有一致的精神，這個精神，就可以完全壓倒敵人，所以革命軍第一件要緊，就是要團結精神，忍勞耐苦，敏捷確實。革命的戰術，就是以少數戰勝多數，不單是不怕敵人，並且使得敵人怕我們。然而革命軍的數目不多，究竟是能力沒有幾多，所以我們兵力要集中一塊兒，來打敵人要點。如果集中兵力，專向一點去打他，恐怕還要被敵人包圍。然而你要曉得以少數戰勝多數的軍隊，往往是要受包圍的。但是你能集中一點，拚命打破他要緊的一角，那其餘的敵人就會潰散的。所以我們攻擊的時候，不要怕側面背面的敵人來包圍來抄襲，只要計算距離與時間，

拼命的打破他最近最強或最弱的一點。先打完此點，再打旁的。就是他有的從側背打來的時候，而我們現在攻擊的，還是要認定一面來攻擊他原有的陣地，堅忍下去。打破了他那一點，便可衝破他的戰線，他就自然而然後會渙散的。革命軍既然藉精神鞏固去打破敵人，這精神的表現，就是冒險。不冒險不見得有精神。一定拿自家生命和敵人拚個死活才好。這樣才可以有少數打勝多數敵人的希望。以前俄國革命軍所以能打勝仗，完全是一種革命軍，拿少數來戰多數的，往往在敵人想不到的地方來進攻。比方敵人靠山臨水而陣，敵人定以為紅軍萬不能通過的，敵人這樣想，俄國軍人總不如他所想，突然包圍襲擊，出乎敵人意料之外，所以很險阻的地方，革命軍都可跋涉。這樣子包圍敵人，敵猝不及防，完全可為我們所包圍打破的。要是沒有冒險的精神，耐勞的決心，動作不快捷，精神不團結，不能具備革命軍的特質，必不能打勝仗」（見黃埔訓練集選輯）。

祇就上面所說的五點，已可斷定敵人有必敗之理。現在敵我相持，勝敗異勢，敵之必敗，就證明我有必勝之道。單就軍事來說，在第一期作戰的時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帶作戰，他的陸海空軍與機械化部隊，可以進出運用，縱橫自如，在這樣的戰場上，作戰到了十八個月之久，他不但不能使我們失敗，而且我們還愈戰愈精，愈戰愈強。此後第二期作戰，進入到了地形複雜，山岳交錯，沙漠無際，交通給養，皆極不便的戰場，他的伎倆，當然更難施展。何況他全國兵力已使用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了。大家都知道，敵國的軍備，本來以百分之三十準備用于中國，而其他百分之七十，全為備俄之用，今日他在我中

國，不僅使用的兵力，已超過了他預期的一倍以上，而且在中國死傷人數已經到了他全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了，看敵軍的兵力使用與損傷，已經到了這樣程度，這就可證明他侵略的失敗已經是確定了，而且以後的戰場，彼我難易相較的話，我們一個子彈，至少可當三個子彈來用，我們一個士兵，至少可抵敵人三個士兵的力量。而敵人方面，適得其反。以後作戰，由我們這一年半過去的事實和經驗來說，敵人至少要以三個人當我軍一個人，要以三個子彈當我一個子彈來用，或許還要加多幾倍亦未可知。

右更就倭國兵力，說明其不能支持長期戰爭。按倭國平時現役的軍隊，共

有一百二十萬，現今在蘇所用的軍隊已達到此數了。倭國在兵役年齡中的男子共有六百四十九萬餘人。但在兵役年齡的男子並不是都能當兵的。一部分因為身體孱弱或殘廢，不能打仗，一部分因為從事於必要的生產工作，不能離開。在歐戰時，德國每一千五百個在兵役年齡的男子中，有二百個體格不適宜於當兵，二百個不能離開工作。但倭人的體質遠遜德人，近年來更日見退步。茲將近年來倭壯丁兵役不及格的百分比列表如下：

一九二五年	百分之二五
一九三二年	百分之三五
一九三五年	百分之四〇
一九三八年	百分之四八

這並不是由于倭國體育退步；唯一的原因是倭國農民大多數生活困難，營養不足罷了。以壯丁百分之四八兵役不及格計算，那麼倭國六百四十九萬

在兵役年齡的男子中要減去不能當兵的三百零一十二萬人。因為現在德國農業的機械化還遠不及歐戰時德國，壯丁不能離開工作的當遠較當時德國為多。姑以當時的德國為例，那歷六百四十九萬人中又要減去不能當兵的八十六萬餘人。結果德國能動員的兵至多不過二百六十餘萬人。在過去的二十個月戰爭中德國死傷已在七十萬以上。往後倭人所遭遇的地形比從前更困難，而我們的戰術因經驗而進步，倭人死傷率必加于前。以此推之，試問他二百六十萬的壯丁能夠死傷得幾年？何況他根本不能把壯丁拚盡，還須保留大部分大對付俄英法美四強？倭國不能支持長期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此。

所以今日問題，祇要我國不授敵以可乘之隙，就是最後勝利，確有保障。什麼是授敵以隙呢？我若精神受其威脅，意志為所

動搖，自甘屈服，急求妥協，那就是敵人所大欲。惟有這樣，敵人就可以解脫他無法自拔的苦境，補救他無可挽回的弱點，而我們國家民族亦就要自此永遠沉淪萬劫不復了！總之，我們能持久抵抗，必能得到勝利，如不能堅決抵抗，而與敵妥協，訂什麼和約，那敵人就可根據着屈服條約上他所享有的地位，更無止境的深入，到了這個地步，我們中國就要在敵國所稱「東亞新秩序」，「日滿支不可分」，「東亞協同體」等等新造名詞烟霧籠罩之下，停止了呼吸，蔽塞了耳目，受盡磨難，歷盡犧牲，全部中國無論何地，無論何人，都要受敵人的宰割蹂躪，萬無倖免之理。精神一被脅制，局勢立即變遷，而且屈辱條約

一經簽訂，主奴名分隨之確立，這樣就無異於犧牲我們中國自己世世子孫未來的生命，反而救了敵國的危亡了！

明白了我上面所列舉敵人方面自造失敗自作罪孽的各種事例以後，各位同志，就可以知道這一次中日戰爭如果日本能獲得勝利，那就是世界上一切戰略戰術所有軍事學說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務的原則原理，都可證明無用了。明白了今日敵人多方脅制誘降的意義以後，各位同志，就更可以明瞭我們所應該竭力堅持的是什麼？明白說一句，就是要立定決心，不屈不撓，也就是說我們的精神，絕對不要被敵人所脅制，我們更絕對不能受敵人的欺騙。我們一定要持久抗戰奮鬥到底，不但要

使敵人過去「速決速戰」的目的不能達到，而且要使他現在「速和速結」的狡謀，成爲粉碎。這就是今日我們唯一的方略。這就是敵之失敗，也就是我國勝利，的基礎。我鄭重告訴各位同志，這是我以受全國安危重托的統帥地位，就十八個月來深切體念而得的結論，特別提出來貢獻我們同志的。

諸位同志，更應該使全國同胞明瞭，我們今天務必以宋明歷史爲前車之鑒。要知道宋明的滅亡，並不是敵人外族，有如何優勢的力量，而完全由於當時政府少數將吏，以及社會士流，意志精神的動搖畏怯，乃至全國人民，受他影響，弄到全局敗壞，不可收拾。我們今天有如此良好的國民精神，有如此深厚的

革命基礎，又有我們本黨適合時代的三民主義，祇要不自暴棄，任何力量也不能滅亡我國。

按宋明之亡，並非由於外族本身有什麼優越的力量，這也是一個很精確的歷史觀察。蒙古在長驅破宋之前，圍攻了襄樊二城凡六年然後得手。二城之陷，乃由於宋不遣兵赴援。二城陷後蒙古乃得沿江直下。假使宋朝力撥襄樊使之固守，同時在沿江一帶佈置了許多像襄樊的重鎮，蒙古怎樣能滅宋？當時宋朝並非無兵，有兵而不善用罷了。襄陽陷後，京城一帶還有兵七十餘萬。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主張把這七十萬人調往前方守禦，賈似道怕內防空虛，不聽，故蒙古得長驅直入。明末東南淪陷後，江陰以一孤城，因民衆憤激，自動拒守，還支持八十多天，殺死了滿兵七八萬。假使當時各地官將都矢志不降，發動民衆，每一大城都像江陰，滿清怎樣能滅明？

今天的事勢很明顯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敵人必然將更兇橫的憑藉其武器兵力，來作孤注一擲的掙扎，我們的方針，却是很簡單，很明瞭，我們從第二期抗戰開始以後，就要用我們革命的戰略戰術，以更奮勇堅決的抗戰，根本打擊敵人已動搖的意志，已疲竭的力量，很迅速地促起敵人的總崩潰和最後失敗，來完成我們革命的任務。

我再告訴我們同志一句話，我們目前如果妄想妥協，希求僥倖和平，就無異自投羅網，自取滅亡。須知敵國前相近衛上月二十二日發表的所謂調整國交的談話，實在是誘降的文告，而不是講和的條件，如果依此而講和平，老實說就是降服。我們中

國民族有志節，有廉恥，有前途，抗戰一年有半，犧牲儘管重大，力量愈戰愈強，凡是我們中華民族黃帝的子孫，爲要對得起我們的祖宗父母，對得起後代，對得起自身，對得起無數爲抗戰犧牲的先烈，就決無甘心降服之人。

我們今天唯有全力決戰，以必死之心來抗戰，戰到達成目的之日爲止，要知道降是生中求死，決無倖生之望，戰則死中求生，且有必生之道。

(一)

我現在再就我們抗戰自身作一檢討：我可以說不但敵人有必敗之道，而且我國有必勝之理。孫子說：「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要做到不可勝，當然要我們流血流汗來努力奮鬥。但是我們從歷史，地理，文化，經濟，以及民族精神，各方面看來，拿已往事實來說，我們先天條件上實在有使敵必不可勝的基礎，只要配合上我們人爲的努力，必可以戰勝敵人而絕無疑義。

（甲）就歷史來說：我曾經說過宋明之亡，是一姓一家朝代的敗亡，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滅亡。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是永沒有被人屈服過的，不僅是未被人滅亡而已。而且宋明當時，朝代的覆亡，也祇是由於極少數的將吏無胆識，無氣節，只知個人苟且偷安，自私自利，而不顧民族的禍福。那時是君

主專制時代，朝廷和民間隔成兩極，痛癢既不相關切，人民抵抗力量一時也不能發揮，實際上當時整個民族的精神，是未受制于外族的，而且是始終與外族侵略者，抵抗到底的。待到民族普遍醒覺以後，雖時隔二三百_年，終能夠攘除夷狄，光復河山。何況現在是以民爲主的民國時代，現在國民政府是革命政府，亦就是國民的政府。革命政府必爲民族利益而奮鬥的，亦是爲人民利益而存在的，是認識我們自己的責任而不能受人威脅的，是要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而絕對不怕武力侵略的。我們今日的抗戰，是政府人民意志精神與力量，交互密合的一致行動，孫子所說的：「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

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這是戰爭取勝開宗明義的第一個大原則。我們這一次對日抗戰，確能做到這一個原則，我們全國一心，上下一志，在國民政府號令之下，老弱婦孺，皆知殺敵自衛，皆聽約束指揮，真是所謂「死而無怨」，更無人願出賣祖國世代的生命，而甘作日奴。我國幾千年來所謂「可殺不可辱」的志氣，已經由敵寇的獸行，普遍喚起，所以的歷史來說，中國決無可亡之理。從以往歷史來看今日，由民族意識及時代精神來測驗這次的抗戰，中國更無被人戰敗征服的可能。

按「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是永沒有被人屈服過的」這是一個雖新穎而實正確的歷史判斷。元朝自推翻宋室後雖然名義上統治了中國八十多年，但在前三十餘年間，繼文天祥，張世傑而起的抗元自主運動，絡繹不斷，這些

運動，元朝的記載統稱爲「江南羣盜」的叛變，其實都是中華民族革命軍的挺起。在末二十年間，則自韓林兒發難後，復漢的義旗，遍地豎起，直至把元室傾覆，把元人驅出塞外爲止。中間元朝只有三十年表面的太平，而這表面的太平時期正是漢族革命的醞釀時期。衡以西史中英法間百年戰爭的例，我們可以說，在宋明之間，蒙古與漢族作了一次百年戰爭而蒙古終於失敗。再看清朝，自從定都北京後，名義上雖然主宰了中國三百年。但在最初的三四年間，明宗室及遺臣志士所領導的義軍，前仆後繼的和滿人搏戰，直至康熙二十二年台灣鄭氏之亡清廷始得喘息。在最末的六十餘年間則先有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搖撼了他半壁江山；繼有孫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終於傾覆了他的社稷。中間自台灣鄭氏之亡至太平天國之起，凡歷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四朝，沒有一朝不緊接地發生漢人反清的變亂。舉其最著者：康熙朝有台灣朱一貴之變，雍正朝有鳳

山吳福生之變，乾隆朝有台灣林爽文之變，嘉慶朝有蔓延川陝鄂湘黔粵六省的「教匪」之變，又有天理教林清之變，勢力侵入宮闈，嘉慶帝幾乎不免；道光朝在太平天國前有林永春之變，嘉慶張丙之變。此外四朝中還有小規模的反清事變十餘起，這裏不必列舉。總之滿人在清朝三百年間可以說是沒有一天安穩地統治着中國。說「當時整個民族的精神並未受制於外族，而且始終與外族侵略者抵抗到底」，絕不是誇張之談。在過去民族意識沒有普遍覺醒的時代，中國人尙且不可屈服如此，何況處今民族意識正蓬勃飛揚的時代？

宋明之亡只是朝代的斷絕，一姓一家的政府的傾覆，而不是整個民族的敗北和屈服，這是毫無問題的歷史事實。至於當時朝代所以斷絕，政府所以傾覆的主因，分析言之，計有四項：（1）沒有英明勇武的最高領袖，掌握中樞的人沒有抗戰到底的決心；（2）政府與民衆分離；（3）政府內部不一

致；(4)疆吏大將不獨很少能守土抗敵，而且多數賣國求榮。以上四項，前而已經分別說明。而這四項無一不與現今中國的情形絕對相反。即此以觀，宋明末季的歷史之不會重演於今日，是可斷言的。

(乙)就地理來說：我國本有天然足禦外侮的地利。從前長城的建築，就是我先民利用地勢以作禦敵設備的一個偉大的工程。我國面積廣大，東西經度跨有六十五度以上，自南至北兼有寒溫熱三帶的氣候。所以我國論述軍事成敗，就以天時和地利並舉。內地及西部，湖沼縱橫，山岳錯雜，平原沙漠，無所不備。就面積言，過去無論任何外族，皆只能亡我一部分一時期而不能永久佔我之全部。就是元清兵力最盛時代，也只能佔到幾個據點。而我們民間反抗的勢力，依舊存在普及於全國。今

日敵人僅以七千萬人口，要來吞滅我人口比他六倍以上的廣大衆庶的國家，要來消滅我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民族，豈非夢想？至於從現在抗戰地勢言，我國地形複雜，已如前段所說，再配上堅強的民氣和人力，任何武器，皆有窮於使用的時候。所以就地理言，我國又必無被敵戰勝征服的可能。

按過去中倭的主要戰場是黃河下游的大平原，江淮間的大平原，及長江沿岸。在這些區域內，險阻甚少，交通極便，倭人得充分利用他機械化的戰器及交通工具。但即使在這樣有利的情形之下，倭人對於廣大的面積，仍無法支配。過去十八個月內倭人獸跡所加，雖說有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十三省。除察哈爾綏遠的情形現在還沒有調查清楚外，我們試把其餘十一省的

狀況考察一下。這十一省共有九百四十一縣，其中五百八十三縣的縣境完整如故，縣長仍駐在縣城照常辦公。這類的縣份佔總數百分之六十二。其次有三十五縣縣長仍在縣城辦公，縣境的一部分，却暫時被敵軍佔領了。又有二百四十五縣，縣城被敵人佔領，但是縣長却仍能在鄉間行使職權，這類佔總數百分之二十六。還有二十三縣的縣長，已移駐鄰縣，可是他們沒有失掉行使職權的能力，他們的命令仍能達到本縣。最後，有五十五縣全部爲敵人所佔領，縣長的職權一時不能執行，這一類佔總數百分之六，並且這五十五縣之中，有四十二縣在河北省，而這四十二縣之中，又有二十二縣是在七七事變以前漢奸殷汝耕所組織的「冀東特區」之內。敵人經過一年半的血戰以後，新佔領的地方，除察哈爾，綏遠一部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漢口，廣州等市以外，僅祇三十三個殘縣，在這些市縣裏面，我們的游擊隊猶時常出其不意的給敵人種種威脅和打擊。上面所

說的十一省中，河北省是倭人經營最久，控制最便的了。我們試拿河北省做例，看看所謂「淪陷區域」內敵我對立的詳細情形。河北省沿鐵路的城市，在一年多以前，已經被敵軍完全佔了。不近鐵路的內地區域，雖有時受日本的短期蹂躪，在這一年內，却是在逐漸組織起來，到現在可算已具規模。河北省內現有兩個內地區。(1)一個可稱為冀西區；牠包括平漢路以西的山地。阜平是這個區域的政治及軍事中心，也就是第八路軍所組織的冀察綏邊區政府的所在地。邊區政府約在前年年底成立。冀西區據有西通五台的路線，形勢非常險要。去年十月內，阜平曾一度被敵軍侵入，但在十月底左右又被我軍克復了。(2)第二個內地區域可稱為冀中區。牠的領土在平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平綏路以南，滄石路線以北，約共二十五個縣。這個區域的領袖呂正操將軍原來是萬福麟部下的一個團長。黃氏率領他的部屬總退却時，這位將軍不退，仍舊帶來了他的部下與敵人風

旋于冀中平原；幾個月後，他的原有部下只剩了五六百人；但那時敵人已疲乏了，不得不退出冀中；於是呂將軍得了機會，將冀中區域重新組織起來。那裏原有張蔭梧所訓練的民團，就應召起來，組成抗日部隊。又加以民衆訓練，於是抗日實力益增。結果是冀中區的現有部隊已到約十萬人之數，槍枝亦有此數。區內有一小兵工廠，能修理及製造普通的槍，能做手榴彈及燃燒彈。爲阻礙敵人前進起見，區內與區外間的公路交通已經割斷。冀中區內准許流行中交三行的鈔票，河北省銀行的舊票及冀察綏邊區銀行所發的新票。北平偽政府所發出的準備銀行鈔絕對不准使用。區中貨幣政策是拿邊區銀行的新票來收回三行鈔票及河北省銀行舊票。換句話說，就是拿法幣做新票的擔保品。有時區內的愛國商人到偽政府境內收賬，收到了偽幣，替區政府買些必需品，讓法運到區內去，區政府就拿區內能用的鈔票還給那商人。區內去年的麥類收成甚好；因禁止糧食運出區外的

原故，據說存糧可夠兩年之用。棉花原爲該區的重要輸出品。因輸出後不免爲敵人所利用，故棉花的種植已經區政府限制；只種相當畝數，使民衣無憂。高陽原有著名的織布手工業，所以區中的軍裝及民衣勉強可以自給。區內有平津各大學生畢業生及教職員數十人在那裏工作。有兩位英國的經濟學家曾經到過區內兩次，貢獻些有價值的經濟政策。有一位美國的新聞記者亨生，也曾到過區內兩次；他的報告的內容曾登載於六月初平津泰晤士報兩日的評論中；他另有一篇記載，發表於去年八月份美國的亞洲雜誌。(3)第三個內地區域可稱爲冀南區。牠的領土在平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滄石路線以南。這個區域內的多數抗日部隊，聽說也屬於第八路軍。政治組織也受該軍幹部的指導。(4)冀東區也許不久可以組織成第四個內地區域。第八路軍於去年七八月間攻入冀東，轉戰十餘縣，時常將天津山海關間的鐵路割斷。但是在十月初冀東區仍在混亂狀態中，還沒有產生

能維持治安的政治組織。沿鐵路做遊擊工作的部隊，除了從內地區域派出來的軍隊外，還有許多自稱游擊隊。他們的組織及名稱，不免紛歧：有民間的志士所自願組織的，例如在平西門頭溝持久抗敵的趙侗部隊；有中央直轄的人員所組織的，例如忠義救國軍；有大地主所組織的連莊自衛軍；也有久離行伍的軍官所臨時招募而成的部隊。

以上是河北省的現狀。試想倭人在河北省尚且無法伸展勢力於鐵路線以外，甚且無法維持鐵路線的安全，在其他省份更可知了。以我國土地之廣，過去侵略的外族所以能控制其大部分者，全靠「以華制華」，「傳檄而定」。現在倭寇既不能使用此策，每想擴張一寸一尺的土地，都要用兵去攻取，每佔領一寸一尺的土地都要派兵去防守。倭兵所不如，地非其有；倭兵一退却，地復歸我。過去倭人動兵百餘萬，實際只能佔據我的三十幾縣，以此推之，即使倭人傾全國二三百萬之兵來，實際所能佔據我的土地有

幾？何況倭人根本不能傾全國的兵力來？何況倭國對於百餘萬遠征軍的耗費的供應，現在已成爲問題（詳後）？所以就面積而論，我國是絕對沒有被倭寇征服的可能。更就地勢而論，今後倭寇如更要深入，無論從西北，西南或中部前進，都再沒有像河北或江淮平原那樣，鐵路公路，縱橫交錯，可便重砲的運輸，坦克車的馳驟；再沒有像長江下游那樣深廣的水道，可容海軍的活動。他們所將遭遇的乃是重山複嶺，絕險危谷，大漠荒碛。倭寇如再前進，這些地方就是他們的葬身之所！

（丙）就文化來說：自有歷史以來，亞洲國家，就只中國有獨立悠久的文化；亦只有中國以文化沾被外族，乃致使進入中國的外族，都受了同化；決沒有任何外來文化，能消滅我國固有的文化。至於現代科學，則是世界共有共享的文化成果。但中

國文化自然有其獨特的精神。這不必廣爲徵引，只看現在我國內地鄉僻民衆，無分男女，遇到敵人，每每有忠義節烈可歌可泣的行爲，就可見中國文化力量植基的深厚。敵人要想以不東不西的模擬文化，消滅我們民族精神，他在許多淪陷區內已經受了不少失敗的教訓。只要我們齊心一志，堅決奮鬥，抗戰愈久，民族正氣，必愈發揚，而且在抗戰期間，將要錘鍊出來我們文化更光輝篤實的力量。所以就文化及民族精神言，中國又決無被敵滅亡的可能。

按文化可分爲三方面：（1）指引並規範生活的理想，（2）供應並便利生活的工具，（3）消遣生活餘閒的文飾。現代科學大部分屬於第（2）方面，一部分屬於第（3）方面。而我國過去在文化上特獨貢獻則屬於第（1）方面。

所謂文化或民族精神就是生活理想之深入於一般人心而與他們情感緊連固結的。我國的文化或民族精神，若用簡單的辭語來概括，可以說是「宏毅中和」。「宏毅」就是論語裏「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的「宏毅」。「中和」就是中庸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中和。我們又可以說：中和是體，宏毅是用。中和表現於個人則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是「七情諧協」，「六欲得宜」；不矯情絕欲，也不恣情縱欲。中和表現於社會則是「禮樂」調節中的共同生活，以互讓互助，化除鬥爭；是人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普遍的「仁」。中和之表現於國際的政策則是「修文德」以「來遠人」，是「化干戈爲玉帛」，是「興滅國，繼絕世」。不過中和是自內發的一種要求，一種理想。而外界的勢力，每每有要阻礙我們的要求，摧毀我們的理想的。我們對於這種外界的盲目的勢力，不是容忍，不是退讓，而是要把他克服。克服的武器

便是「宏毅」。這是一種不耀武，不揚威，却不可屈，不可撓的毅力。這是一種積養蘊蓄，久持延存的至勇。我民族及文化之所以能夠挺立萬古，先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及文化而居長，後歷史上其他任何民族及文化而不凋，都賴這恆永的宏毅。自抗戰以來，我們的軍士民衆的一切忠義節烈可泣可歌的行爲都是這恆永的宏毅的表現。倭人的文化及民族精神却恰恰與我們的相對反。和「宏」相對的是「狹」，和「毅」相對的是「暴」，和「中和」相對的是「偏激」。他們的偏激已到了瘋狂的程度，他們的狹隘已弄到他們與世界爲仇，他們的暴力只是老子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夕」的暴力。「狹暴偏激」的精神，已領導了他們走上「全民族切腹」的路，而且非走到盡頭不止。

(丁)就經濟來說：現在戰爭，起因往往在經濟的掠奪，而成敗勝負，也往往以經濟能否持久，爲決定的因素，我國是農業國

家，正在建設期中，突受暴日侵略，當初原是深可顧慮的一種危機。但是自從開戰至今十八個月中間，不但我們財政基礎沒有受到如何重大影響，而且金融是始終穩定的。後方民衆的生活，更沒有受到戰時的影響，而且大多數省份由於去年農產豐收，消費節約，民間反而顯出充裕的現象。這就是因爲我們是農業國家，富有強韌的持久力，不比工業國家容易受到戰爭影響。我們現在進入了第二期抗戰以後，深信戰時經濟，決無問題。我們在抗戰根據地的西南西北諸省，積極的開發國防工業，中小工業，和礦產林木，以全國的技術人才資本，集中力量來作，必可爲國家經濟建設，確立永久的基礎。就是軍需民生

，也可不虞匱乏。我們農業國家，戰時經濟持久力的堅韌，這更是敵人所未會計及的一點，又是敵人一個最大的失敗。所以就經濟言，中國是足可長期抗戰，而決沒有被敵屈服的可能！

按農業國家，比之工業國家，固然有一重要的缺點，即生產機械化的程度和人民使用機械的能力低下，因此在國防的器具上不如工業國家，這是無可諱言的。但農業國也有一優點，爲工業國家所無，那就是，不易受到根本的全體的傷損。因爲工業國家的生產力是集中的，各部分在經濟上是密切地互相依倚的。一部分受打擊，可以影響到全體。例如工業國的工廠，集中在幾個大城。幾個大城一被炸毀，若干大工廠一停頓，全國就要感受到生活必需品的匱乏。但農業國的生產力是分散的，全國可分爲無數經濟上自足自給的區域，一區域雖然失陷或被摧殘，別區域依然可以生活如常。

。工業國好比一座點電燈喝自來水的城市，電力廠或自來水廠的機器一壞，便全城黑暗，全城受渴。農業國却好比一座點油燈喝井水的城市，無論城市任何部分受到怎樣的損害，其他部分依然有燈點，有水喝。抗戰以來，我們後方民衆的生活所以沒有受到戰時影響，就是這個道理。還有一層，工業國要靠國外市場去銷售它的製造品；要靠外國市場以交換得製造的原料和本國所缺乏的日用品；所以一遭遇到封鎖，生產事業便停頓，人民的生活便感到困難。這又是我們農業國所不須顧慮的。至於機械化的武器之缺乏，則因我們是爲全世界的正誼與和平而戰，得道多助，外來的接濟，可以源源不斷的。

反觀倭國，他雖說是一個工業國，却是一個畸形的工業國。他的輕工業特別發達而重工業則遠遠落後。歐脫萊女士在「日本的泥腳」一書裏說：「日本的重工業，集中於軍火的生產與造船。除掉這些，便剩沒有多少了。此

外只有電業及機車與車輛製作業。至於機器及機器工具，日本自己只能生產百分之五十。一九三三年，日本自己生產的機器工具，僅值七、八九八、〇〇〇元。製造發動機的，只有一〇、〇〇〇人，每年產品共值三百五十萬鎊，一九二四年英國的同类產品却約值一千三百萬鎊。但發動機是日本機器業中最重要的一個分枝。在工程業中，小工場佔很重要的地位，這事實造成嚴重的弱點。大工廠把零件包給小工廠作，做好了以後，交由大工廠配合攏來。其目的本是要把全國的生產力發展到最大的限度，但這反是一種危險與浪費。因為這種制度不能使軍械與機器得到所要求的準確。日本飛機非常容易出事，其原因在於機件有技術的缺點，各製造者不能嚴格遵守確定的標準。某日本報紙說過：有一個公司獲得了陸海軍的合同來製造飛機，他必須和四五〇個小工廠合作，各小工廠又把工作分給其他小工廠或家庭。大的飛機工廠只有四個，牠們的任務在於把各部機件配合起

來成爲飛機。這種生產方法，大可以說明日本空軍的無效能，與民用飛行水準之低，因爲造出來的機件不好而且不可靠。日本的重機器業，不很發達。這是日本最嚴重的弱點。沒有機器業，便不能很快地產生大量的軍火。她輸入大量的內燃機，五金機器，汽車機件火器。還要輸入縫紉機，紡紗機等。日本最新的工業部門——汽車與化學業是怎樣呢？福特與通用兩個美國汽車公司，在日本都設有很大的綜合廠。日本出賣的大多數汽車，都是她們兩家的出品。本地的汽車生產，在近三四年發展出來。汽車製造廠，只有幾家，出品不夠需用，而且出品的質地很壞。因而軍部的定單的大部份，必須交給福特與通用。一九三三年，日本出賣的汽車，共有一七、七九〇，其內只有百分之十，是日本作的，其餘的汽車，都來自外國人辦的綜合廠」。美國研究日本軍備的專家譚寧和都罕爾氏在合著的「當日本在戰時」一書中，關於倭國重工業的結論道：「現有的日本重工業，還

包藏着以下各種弱點：（一）日本的鋼鐵工業平時不能供給國內的需要，戰時連陸軍的需要都不能供應，這一點使日本不能不倚賴於外國的鋼鐵物品；（二）一般機器製造業，特別是金剛工具方面，動員擴張之不足，這一點將迫使日本輸入大量外國機器；（三）機器製造業中特別屬於戰爭的諸部門，如飛機，汽車，及坦克車的製造等，沒有達到適當的發展，而且苦于在現代戰爭中有特殊重要性的部門，根本還沒有」。此外倭國戰時所需的原料和燃料，也不能自給，譚富友郁罕二氏在前書中關於此點的結論道：「戰爭所需的原料和燃料，日本沒有充分的供給。鐵苗極端貧乏，非鐵質金屬的缺乏，石油的整個倚賴外國，原棉和羊毛的整個闕如等等，大大限制了日本對於大戰需要的供應能力，在平時日本可以裁長補短，少買些外國物品，但是戰爭來到後，武器，彈藥，運輸工具等，毫不留情地給與國民經濟以無限的要求，那時全國原料和燃料都要大受恐慌，日本不得不全盤

依賴入口貨」。從上面看來，倭人要支持戰爭，每年需由外國輸入大量直接或間接的軍需品和原料。倭人所勾結的德意在這兩方面都是「泥菩薩過海，自身難保」的，不能給與倭人以什麼助力的。即使英美法等民主國家永遠對倭不實施經濟制裁，永遠不限制軍需物品及原料輸往侵略國，倭人至少要拿外匯或現金向他們買。然而倭國現在的金融狀況怎樣呢？倭國的國際收支自從一九三六年以來是入不敷出的。不敷之數如下：

一九三六年 二萬三千〇三十萬日元

一九三七年 八萬八千二百六十萬日元

一九三八年 七萬三千六百萬日元

一九三六年，倭國已把多年積起來的外匯送出去。一九三七年，這個來源已經乾枯了，只有把金子運出去。倭國並不發表黃金輸出口的統計，但在一九三七年，美國所發表的統計，表示該年倭國輸往美國的黃金，共值日

金八萬八千萬元。一九三九年日本的國際收支，預料比以前還要不利，外匯變得的艱難，比以前還要增加。外匯贏餘的獲得不外靠兩條路：（1）增加輸出，（2）減少輸入。但（1）輸出的增加，是很困難的，不管倭國政府如何努力。倭國積聚的原料，已是逐漸的減少，而這些原料，又是製造出口貨所不能缺少的。價格的變動，對於倭國貨物的輸出，也給以相當的困難。據橫濱正金銀行的計算，倭國于一九三八年輸出的貨物，價格已增加百分之二三·九。可是製造成本的加增，比輸出貨物的價格的加增，還要來得快。因為外國的原料，平均已加了百分之二四·三，而且國內的批發物價，較一九三六年已加了百分之四十。價格既然加增，在國外市場上與別人競爭，自然處于不利的地位。（2）進口貨物的減少，也不容易。因為即使照現在的狀況繼續下去（一九三八年的進口數量，已比一九三七年減百分之三〇·二），不但輸出貿易要受到不良的影響，就是戰爭的繼續，也要

感到困難。因為以前積存的原料，在戰爭的第一十四個月中，已用去了不少。舉例來說，棉花的存量，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已較一九三七年七月，減少百分之六七·七；美國木材，已減少百分之七二·一。別種原料以及軍火的減少，其程度與此當相彷彿，雖然此種存量減少的統計，是外間所不易得到的。一九三九年，倭國產金的估計，為二萬萬日元。假如倭國的國際收支，入不敷出的數目，要超過此數，就要動用本國銀行餘下來的那點金子了。這點餘下來的金子，最多不會超過五萬萬日元。假如倭國在一九三九年的國際收支，與一九三八年相等，那麼倭國所有的現金，都要流出國外了。到那時倭國非獲得大量的國外借款，財政上就不能維持。

現在戰爭，不僅應知彼知己，尤需要知道國際形勢發展的方向，敵人不但不認識自己，不認識敵人——我們中國，簡直也不認識時代環境，當然要步步趨於失敗。這一年的國際形勢，大

體說來，表面上雖然是動盪不安，而其潛伏的主流，總是朝着維護信義和平的方向前進。尤其是歐美幾個民治大國，應付變局，非常謹慎。在民衆方面，排斥侵略，主張公道，一天天的有力。就是他們的政治家，一方面苦心孤詣的想穩定現有的局勢，同時也決不放鬆充實自身力量的準備，從種種形勢，更是日趨明顯。我們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早已看定唯有公理正義的道路，才是人類共循的道路。凡是能自強自立的國家，即使一時困苦犧牲，久而久之，自然可以得到正義方面的共鳴。就最近國際演變的跡象來印證我們六七年來的觀察，實在是絲毫不爽。

九一八以來，我國始終委曲忍痛，尊重和平。敵人繼續擴大侵略，漫無止境。他全不知道現在是「民族自決」和「民族主義」思潮澎湃的時代，小民族尙且要求崛起獨立，世界列強，也都改變過去的態度和方式。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敵人，還要妄想以七千萬人口的國家，要來吞滅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塘沽協定以後，我國立國生存，已到了最低限度。到了這個地步，日本還要破壞中國生命所繫的一線生機，無端起釁，佔我平津。這一個最低限度，尙且不許我們保存，那就是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了。與其雖存猶亡，就祇有奮鬥。古語說：「兩軍相遇，哀者勝矣」。我們的士氣民心，完全是悲哀憤激，

有死無他。這是世上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哀兵」。而我們的抗戰，也就不僅爲捍衛本國的獨立生存，同時更爲維護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所以我們這一戰，又是堂堂正正的「義戰」。而敵人無故的侵略中國，乃是師出無名的自殺自殘的「暴戰」。

我們在開始抗戰的時候，早已算定今天的一切艱難困苦，甚至比今天還要加深十倍百倍的艱難困苦。但是這一個神聖任務，既然加到我們民族的前頭，我們就必然要排除萬難，以無上的犧牲來達成我們國民革命前任務。我們一定要打擊侵略，要國際條約恢復效力，要公理正義伸張，尤其要以我們的堅決抗戰

，證明暴力橫行之必敗，改移世界全體人類之視聽，永保國際的和平。同志們！必須知道抗戰以前，世上視我國為三三國家之不如。現在我們與一等國家的日本，戰鬥到一年半以上，尚且不為敵人所戰勝，我們當然不必再畏敵人的暴力。我們的前途誠然還不免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抗戰進入了第二期以後，我們確信戰局必然是一天天順利，一天天接近光明。問題全在我們有沒有不屈不撓長期持久的精神，有沒有舉國一致，愈戰愈奮的努力。

(11)

由於上面敘述，各位同志，可以確實認識我國支持奮鬥的實力

，認識敵國的戰略政策，認識其他方面各種實際情勢與演變的過程，即可瞭然於成敗勝負之所在。自古大勇生於大智。我們對於抗戰之使命和前途，既有這樣顛撲不破的正覺，就必能自然而然的生出勇往無比的決心和信心。現在我們抗戰是已經進入了第二時期，無庸諱言的，我們已損失了不少的土地，和大部份的交通綫，犧牲了同胞不少的生命和財產，被攫奪了無數的產業和資源。可是我們要知道：革命的工作，多半是從平地做起的。我們今後就要以現有的土地，人力，軍力，財力作打算，恢復我們同盟會以前革命先烈，手無寸鐵毫無憑藉而舉起義旗反抗外族統治的精神，從小處低處極艱難困苦處，腳踏實

地，定下具體行動的方案和計劃，定出了方案計劃以後，就要竭我們的心血時力，一條，一字，一句，都要切實作到。敵人宣稱「戰爭要百年化」。我們認為抗戰建國的工作，是沒有時限可定的，五年不成則十年，十年不成則百年。一天不達到目的，我們就一天不停息。我們怎樣來努力呢？我們要針對着敵人的情形來努力。今日的敵人，正如孫子所謂「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我們知道了這一點，就要以我們的統一團結，來對付敵人的驕妄凌亂，以下剋上的敗象。我們知道敵人在戰爭期中工業停頓，經濟破綻，日益顯露，就要我們發揮我們農業國家的特長，刻苦節約，堅忍支持

，來加深敵人工業國家的弱點。我們知道敵國大欲所在，是要根本毀滅我民族經濟基礎，我們就要加緊充實我們戰時一切的建设，培養持久抵抗的力量，以促起敵國社會崩潰的危機。我們知道敵國去年以來，天災流行，風災水災，加以繼續發生不斷的大地震，使他們國內被迫作戰的民衆，格外受到痛苦和損失，我們就應該利用我們天時地利的優點，加緊農業生產，以對抗天災人禍，不可終日的島國的缺點。我們知道敵國人痛苦日深，敵國政府，統御無力，他的朝野上下，反戰意識日濃一日，我們就要真實力行我們的三民主義，來打擊敵人殘民以逞，害人自害的贖武主義。總之，我們今天的要務，是

要以精神勝物質，以勤儉補缺乏，以加倍努力，補已往的蹉跎，以犧牲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心，來補我們武器和近代軍備的不足。

BC

93.09